

走向儒学的深层

——“现代视域中的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苏森森

近年来，围绕如何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等问题，学界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以此为背景，2009年5月22-23日，“现代视域中的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美丽的丽娃河畔举行。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国际儒教文化论坛联合主办。共有来自中、韩、日、美、德等国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潘德荣教授主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和国际儒教文化论坛常任代表、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学部崔英辰教授分别致辞。杨国荣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以现代化过程中哲学、文化的发展为背景，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儒家以仁道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为进路的形上向度、以理性精神和意义世界为内容的人生之境。仁道原则可以时时告诫我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避免遗忘人的存在意义，并在主体间交往与天人的互动中抑制过度的功利冲动；在本体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形上进路，为存在与“在”的统一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它可以提醒我们在存在的终极关切中避免超验的玄思；人格之境所展示的理性精神与意义关怀，则可以不断引发我们致力于理性尊严的维护与意义世界的守护。正是在这些方面，儒学蕴含了其内在的生命力。

讨论会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

（一）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

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题为“儒学与全球化中的人权对话”的报告中，以西方人权理论为个案，深入探讨了传统儒学与现代人权观念对话的可能性。陈教授指出，古典儒家是以“政府义务”而不是“个人权利”来表达近代人权观念的某些

诉求的，这些要求比较集中在基本生存权利方面。事实上，即便传统儒家“本无”近代人权观念也并不就排斥其“后有”。从还原后的实质内容和具体主张来看，近代人权观念完全可以被儒家思想吸纳为新发展的一部分。在多元现代性中，我们既要承认人权概念的普遍意义，也要容许各种文化对于人权概念采取不同的侧重和理解。只有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平等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杨国荣教授的报告题为“精神世界与意义追求——现代视域中的儒学”，他认为对于精神世界的关注是儒学的内在特点之一，这种关注体现了一种意义的追寻，其核心在于理想的追求与使命的意识，就其现实形态而言，它植根于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广义的精神世界既包含人性境界，又涉及人性能力，前者通过指向成己与成物而确认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后者则从一个方面为成己与成物提供了所以可能的条件。以人性境界和人性能力的统一为前提，自由的人格表现为德性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具体融合，传统儒学在这一方面既有其历史的限度，又内含着需要珍视的思想资源，后者在今天对意义世界的追求和建构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川大学黄玉顺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清平教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儒家民本思想作为报告主题，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对。黄教授从《尚书》中总结出周公的政治哲学，认为其奠基的“民本”思想之实质即是“人民主权”，不论是现代民主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权政治，其实都不过是实现这种“人民主权”的不同方式而已，这对于现代政治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刘教授则认为，儒家民本思想虽然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限制统治阶层实行暴政、维护民众利益、尤其是关注民生问题的积极作用，但其中并不包含现代民主思想的萌芽或精华，因为它归根结底不是把民众视为君主官员理应在治理活动中予以尊重的“目的性之本”，而主要是被视为君主官员巩固自身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性之本”。后者与现代的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负面的阻碍作用，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把儒家的工具性民本观念改造为目的性的民本观念，它才可能在现代民主建设中真正发挥积极效应。两位专家的不同意见，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发表意见，展开了热烈的对话和讨论。此外，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贇教授梳理了中国精神、六艺经学与“五四”的历史脉络，提出超越“分科之学”，以经学谱系统摄科学系统，重塑或者说是回归真正的“中国”；贡华南副教授以现象学的方法聚焦于现代生活中的闲与忙，尝试于其中重新展开心性之学。复旦

大学社会学系曾亦、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院李锐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则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分别探讨了“宗族、地方自治与现代国家之建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新时期儒学的一个建设方向”以及“经学、制度与生活”。

（二）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儒学研究

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以熊十力为个案，追溯了近代中国如何理解“哲学”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哲学”的历程，他认为相对于其它肤浅的“哲学”定义，熊氏提出的“哲学就是本体论”已经触及到了西方哲学的真髓，而熊氏的《新唯识论》体系正是会通中西的成功范例。中西哲学能否真正对话，现代中国哲学能否获得独立地位，取决于今日的学者能否就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自己独特哲学思考。浙江大学何俊教授主张儒学的多元阐释与重构，他认为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和知识主义的兴起，传统儒学以道德和心性为主干的思想与体制，应该被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宗教儒学、生活儒学等诸多面向所取代，未来的儒学应该以完整的人为核心进行重建。厦门大学乐爱国教授认为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不单只是成就修身的伦理学，而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之为基础的伦理学，因此从朱熹的格致论接着讲，可以建构起儒家的知识论传统。武汉大学丁四新教授结合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材料，对阮元、傅斯年、徐复观的先秦人性论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检讨。华东师范大学顾红亮教授揭示了冯友兰《新世训》背后受到的实用主义影响，并指出其具有平民化生活教育的意义，可为我们思考现代个人观的建构提供有益参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沈顺福、厦门大学傅小凡、河北大学毛翼鹏、湘潭大学邓辉、上海大学朱承和首都师范大学的盛珂也都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西哲学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发表了新颖独到的见解。

（三）海外儒学研究

美国 Kutztown 大学的黄勇教授提交了英文报告：“德性伦理学的双重困境以及朱熹的新儒学如何避免它们”，他指出西方的德性伦理传统始终无法摆脱义务和后果、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困境，朱熹的新儒学通过人性本善的设定，而不是像

亚里士多德主义那样将人性设定为理性的，从而避免了第一重困境。而人性本善的结论则建基在人类道德情感的客观呈现和人禽之辩上，因此也就跨越了人性事实与道德规范之间的鸿沟。德国科隆大学、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黄凤祝教授界定了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及其共识，并指明这些共识在当今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科学以及经济上、政治上都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引入梁漱溟的文化类型理论，黄教授最后认为，未来世界的文化必然是各主要文化类型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真诚对话、互相融合后的产物。以崔英辰教授为代表的韩国学者，在本次会议中，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韩国儒学的研究近况。崔教授的报告题为“‘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与儒学”，他将“现代性”的定义概括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发展式的社会观以及合理化。以此考察古典儒教思想，发现儒学中间同时存在着前现代、现代性以及后现代的因素，所以儒学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相反它早已内含了现代性的要素。“现代性”的概念是随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的，在每个时代其侧重点也不同，所以现代性的核心应该是“尊严的平等”。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张完硕、郑真旭、吉基台以及江原大学的李喜馥、釜山大学的朴正心和岭南大学的郑炳硕等人也都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做报告。

通过此次会议，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要用同情的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力图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的助推力。与此同时，他们也极力秉持着作为学者的批判意识，对中西文化采取平等对待，辨其良莠，或取或弃。现代化不应该只是单一的西方化，而应该是东西方以及世界多样文化的最优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将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互动中找到一条更加和谐完善的道路。

作者简介：苏森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